



# “项目化生存” 不可能形成鼓励原创的学术生态

■尤小立

近些年,学术评价方式似乎总是在游移、变动中徘徊。应该说,从量化评价到代表作制是科研成果评价的一次进步,科技部、教育部出台的破“五唯”政策则是有关学术评价的综合性进步。

然而,长期的“行政化”让大学一直没能形成产生真正意义上的学术权威的生态,以及以学术成果的学术价值为依据进行学术评判的习惯。相反,学校中一些依赖于原有的科研管理机制而不愿探索、不思改变的懒政心态,既影响管理政策的有效落实,阻碍科学研究水平的进一步提高,也难以使学术评价走向完善。

以科研项目(课题)为例。它的设立和经费发放,其目的当然是为了促进科学研究事业的提高和发展。近30年来,随着各级科研和教育管理部门科研项目投入力度的不断加大,科研经费也在呈几何级数增长,不仅是经费投入的总量,各类论文发表的数量也都跃居世界前列。

以科研项目(课题)名义发放的科研经费,一方面直接促进了国内科学研究水平的提高,另一方面也在深刻塑造着大学教师的生存模式。但由于行政一方的过度参与,科研项目(课题)本身的影响力明显高于人(教师)的主观能动性所释放出的能量,大学教师的生存模式被戏称为“项目(课题)化生存”也就不再奇怪了。

现在看来,学校内部的行政管理部门对项目(课题)的参与主要是在申报阶段。由于申报项目(课题)已经变成了一种“专项技能”,介绍政策、提醒申报

“项目(课题)化生存”不应该是大学教师和研究人员正常的生存状态。因为根据这个生存原则,无项目(课题)就可以或者有理由不做科研,而无项目(课题)也就等于没有被认证的科研目标。这样下去,不仅不能调动大学师生科学的研究的积极性,也不可能形成鼓励原创的科研生态。

时间、辅导填写表格应属于正常的服务范围。但现在的“服务”已经由被动转向主动,凸显出“前端服务”的特点,即一开始以主动出击的方式攻城拔寨,坚决不输在起跑线上。所以,校内上下动员、层层审核,邀请校外专家预先把关、组织公关就成了当然之举。

应该说,这类“前端服务”大大增加了申报成功的可能性,并且成了学校之间竞相效仿的“成功秘诀”。但换个角度看,管理部门强力和主动的“前端服务”也在削弱申报人的作用。整个申报过程中,申报人不再是独立的个体,他成为了学校总申报团体的一员,其项目(课题)申报“团队”也可以是拉郎配式的,他们都不过是学校确定的若干申报环节中的一环。

大学教师和研究人员都是文化人,文化人是最讲究荣誉感的,否则就无文化可言。而荣誉感又往往与其所起作用

的大小成正比,作用愈大,内心的荣誉感也就愈强烈。而现在,申报人的作用充其量只占整个申报过程中的几分之一,他所能体验到的荣誉感自然也只有几分之一。因此,即便是申报成功主要也是得益于“前端服务”,是整个学校的成绩,申报人反而像是沾了学校或校内科研管理部门的光。

当然,在荣誉与物质利益纠缠的环境中,人们对荣誉的认知也在改变。用物质利益换取荣誉似乎成为了某些人成功的终南捷径。

但正像荣誉感与物质利益,一个属于文化,一个属于市场和经济一样,科研管理政策和方式涉及文化,就其初衷而言,也不是以鼓励物质利益为目的。而项目(课题)是科研,也不是生意。但是,在机制不完善之时,任何的操作偏向都可能导致“生意经”的产生。

然而,仅重视科研管理的“前端服

务”,让许多申报人产生了“申报到项目(课题)就等于成功”的幻象,随之而来的学校相关配套奖励和职称晋升又加深了这种“成功幻象”。

近年来,国内一些大学中出现的利用项目(课题)经费进行科研外包、向国际开放期刊购买版面发表成果、通过公关与其他人共同署名为“共同第一作者”或挂名“通讯作者”等异化现象,都不仅是在维护这种“成功幻象”,也是在利用“以小的投入换取利益最大化”的“生意经”,将虚幻的“成功”雪球滚得越来越大。

不重视过程与结果管理的倾向也影响到本科学的学业评价。现在,从本科课程评价和专业认证到本科学的学业评价,都有论文发表数量的条目。但只要有一点投稿经历的都不难看出,这些“论文”大多是在管理混乱、毫无学术规范的期刊上,通过购买版面而发表的,根本不具备起码的合法依据和学术价值。但是,相关课程和专业却因此得到加分而通过认证;有些学生也因此获得评优、保研的资格。这等于在变相鼓励学生投机取巧。

其实,“项目(课题)化生存”不应该是大学教师和研究人员正常的生存状态。因为根据这个生存原则,无项目(课题)就可以或者有理由不做科研,而无项目(课题)也就等于没有被认证的科研目标。这样下去,不仅不能调动大学师生科学的研究的积极性,也不可能形成鼓励原创的科研生态。

(作者系苏州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

## 高教观澜

不久前,伴随着2022年的到来,一则《00后,真的来了》的新闻被送上了网络热搜——再过几个月,当2022年毕业季来临,第一批“00后”就将离开校园,真正步入社会。

从“80后”到“90后”,再到如今的“00后”,几乎每过一个十年,高校便会迎来一批被贴上各种不同标签的“新一代”。如今,“00后”大学生已然成为大学生的主体,历史的接力棒也终究要交到这些学生手中。那么,在经过四年深入接触后的今天,我们对于“00后”大学生的思想行为特点究竟有哪些了解?对他们的教育和管理又该注意哪些问题?对此,笔者尝试进行一些总结。

### 特点:时代造就“双重性格”

首先必须明确,“00后”大学生群体与“80后”“90后”大学生群体一样,整体呈现出的思想行为是积极向上的。他们爱党爱国、热爱人民,也有理想、有抱负、有情怀,渴望体现自身价值,但有时他们的主观愿望和客观现实会出现脱节的情况。

除此之外,“00后”大学生群体在崇尚社会主义价值观和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的同时,也更加追求个性化和自主化。他们崇拜偶像,能听进别人的意见,但主体意识又很强。他们自学能力强,学习方式多元化,并以网络为自身获取知识的主要渠道。这也导致他们的学习碎片化明显。

在社会层面,“00后”大学生一般有礼貌,常常把“不好意思”挂在嘴上,但也容易情绪化。他们人际交往能力较强,朋辈关系较为密切,集体意识和集体荣誉感较强,但乐群性也较强,“青年圈层化”现象明显。他们兴趣广泛,自我提升意识强,但泛娱乐化明显。他们消费观念开放,消费领域多元化,但也会出现偏颇。他们竞争意识强,但也会气馁、“佛系”躺平。

“00后”大学生上述特征产生的主要原因,在于其成长的时代是前所未有的时代,也是极速变化的时代。

当下,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世界多极化不可逆转,全球治理体系面临重塑;经济全球化持续发展,世界经济格局深刻演变;各种文化相互激荡和交融;科学技术突飞猛进,更新换代的周期越来越短;社会信息化迅速改变人们的思维及生产、生活方式……与此同时,中国的发展也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国家周边安全与维护国家主权和发展利益压力增大,国内经济社会深刻变革,各方面矛盾复杂交织……

以上的所有时代背景,构成了“00后”大学生从出生至今的大环境,而在此环境下成长起来的他们,也就更加爱党爱国,同时也更具民族自豪感、更愿意把个人理想融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且,由于“00后”大学生所面临成长环境相对更加开放、自由和多元,也在客观上造成了“00后”大学生所面临的生活压力更大、事业竞争更激烈,他们的自主性、独立性、适应性、变通性、务实性更强,平等意识、表现意识、竞争意识、风险意识、效率意识、民主意识、法治意识更强。

### 理念:“教”在主、“学”在次

“00后”大学生思想行为特点鲜明,优点突出,但缺点也十分明显,加之周边更加多元的时代背景,使得高校对于“00后”学生的教育管理面临着更加困难的局面。不过,经过多年摸索,我们对“00后”大学生的教育管理也已经积累了一定的经验和方法。

在高校的人才培养工作中,“教”与“学”永远都是最基本的整体矛盾,而在笔者看来,对于“00后”大学生培养的基本理念,要坚持将“教”放到这对矛盾的主要位置,而将“学”置于矛盾的次要位置。

也就是说,教师教什么,学生就学什么,这是第一位的矛盾;教师怎么教,学生就怎么学,这是第二位的矛盾;学生没学好,第一位责任在教师,第二位责任在学生。并不是学生想学什么,教师就教什么。教师的责任就是根据学生的成长需求,把教育内容按照一定的体系、步骤、方法传授给学生,同时教授学生认识世界的本领。

教育是先“知”后“行”,强调知了须行。但教育绝不是“知”与“行”的全部,更不是“知”与“行”的终结。教育须通过“行”加深“知”,检验“知”,发展“知”,正所谓在实践中认识真理、检验真理、发展真理,这是学生应该掌握的真正本领。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不能将这些基本问题本末倒置。

因此,对“00后”大学生教育的理念要坚持以人为本,坚定教育的主体责任和教师的主体地位,同时尊重学生,注重调动学生的主观能动性,强调教育效果要使学生内化于心、外化于行。要坚持传授知识与培育能力的一致性,坚持教育学生与满足学生需求的一致性,坚持教师主导与学生自我教育的一致性,坚持教育学生与服务学生的一致性。同时,必须清楚,教育的过程既不要复杂化,也不要简单化,而是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教育的方法、手段只要管用还是越简单越好,而不是越复杂越好。

### 方法:多层次手段相互结合

针对“00后”大学生的心理特点,对于他们进行教育管理的基本方法也应是多层次的,包括将正面教育与情感交流相结合,将理论灌输与寓教于乐相结合,将舆论引导与舆情控制相结合,将严格要求与耐心说服相结合等。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00后”大学生作为伴随着移动互联网的发展而成长起来的移动互联“原住民”,对于网络的亲近感几乎是天生的。因此,对他们的教育与管理一方面要充分借助网络的力量和渠道,同时也应该尊重他们对网络的那份亲近感,将网络传播与网络管理进行适当结合。也就是说,一方面要依规管理,约束其行为,另一方面则要注重人文关怀,尊重其“文化”。

在运用这些基本方法时,要坚持因势利导、与时俱进,善于使用最新的方法手段和知识案例,妥善借鉴他山之石,而不能墨守成规,同时要按照教育的目标、规律以及学生成长的规律循序渐进,而不能盲目迁就学生的弱点、满足其不正当的需求,更不能放弃教育的职责或急于求成。

在教育管理的过程中,要注重管理方式的针对性和层次性,找准学生的兴奋点、困惑点,实施“滴灌”,而不能搞“大水漫灌”。同时,要丰富教育管理的话语体系,提升教育管理话语的吸引力和感染力,而不能简单生硬;此外,还要构建一个分众化、立体化和多元化的全媒体传播格局,善于将教育、经济、行政、法律等方面制度手段进行有机结合,多方面地构建适合于“00后”健康成长的制度体系。

(作者分别为中国传媒大学教授、浙江工商大学副教授)

## 泰国高等教育改革带来的启示——

# “宽进严出”还需哪些“配套措施”

■赵硕 丁仁伦

在刚刚过去的2021年,伴随着提升高等教育人才培养质量的呼声越来越高,我国高校“宽进宽出”的人才培养模式受到了更多诟病,有关部门也在持续提升高校毕业生的毕业门槛。相应的,过去一年也频频有高校清退在校学生的新闻见诸媒体。

然而,尽管高校与有关部门对于“严出”越来越重视,但至少在现阶段,我国高等教育的整体模式依然没有改变,由此带来的毕业生就业能力不足等问题需要引起我们的重视。

在这方面,泰国高等教育的“宽进严出”培养模式值得我们借鉴。

作为亚洲新兴的高等教育发展市场,近年来,泰国高等教育的发展速度正在持续提升,特别是进入新世纪后,泰国高等教育在东南亚地区发展迅速。目前,泰国各高校学生人数占同龄人数的40%,略低于我国的50%。在2020—2021年QS世界大学排名中,泰国共有8所大学入围世界前1000位,其中排名最高的为朱拉隆功大学,位居QS世界排名的第208位。

对于泰国高等教育改革而言,2005年可以作为一个“分界点”——从上世纪60年代至上世纪末,泰国实行的是全国统一的高考录取机制,高考一年一次,分为自然科学和文科两大类。1999—2003年间,泰国高等教育进行了一次改革。在此次改革中,泰国教育部与全国高校校长联席会议决定,自2006年起,全国取消高考制度。在此之后,泰国大学硕博招生制度也于2018年进行改革,采取TCAS录取制度,即通过教育经历、科研成果、获奖奖项等进行的申请审核制,但在毕业环节以“T”字形人才培养为标准,即综合知识能力下的专业技能和个性化创新发展。

由此,泰国高等教育形成了“宽进严出”的模式。在这种模式下,泰国大学重点发展了工商管理、金融、农业、旅游服务、教育、文学艺术、公共卫生健康和医学等学科专业,使得这些重点专业的学生在毕业后,大多选择在本国或东盟地区国家跨国企就业,就业率持续提升,这也说明改革后泰国的高等教育质量得到了国



两位学生在泰国朱拉隆功大学图书馆查阅资料。

图片来源:  
朱拉隆功大学官网

际的认可。

同时,泰国大学在经历了此次改革后,也开始进入内涵式发展方向。

目前,高质量专门人才,特别是尖端人才的培养是泰国高校面对的最大难题。为推进高质量人才培养,泰国教育部一方面通过留学资助的方式,培养了几万名学有所成的研究生回国效力,同时采取积极措施,推动本国高校与国外大学进行多层次、多领域的教学科研合作。另一方面,改革后的泰国大学持续增加硕博招生人数,高等教育体系实现了规模扩张和入学率的快速提升。在这一过程中,“宽进严出”模式保障了泰国大学人才培养质量,也实现了该国高等教育的普及与个性化发展,使其成为东南亚地区规模最大的高等教育中心。

中泰两国同为亚洲邻国,而且当下两国的高等教育都面临对外国际化和对内内涵化发展的双重挑战。在此背景下,泰国高等教育的国际化发展变革也为我国高等教育改革提供了借鉴。

首先,泰国大学实行的“宽进严出”制度是与其国际化进程相匹配的。在“宽进严出”的原则下,国内外学生只要获得相应文凭并通过国际认可的英语水平考试即可申请留学。由此,泰国高校吸引了大量亚洲地区留学生来泰留学。而为了适应这种国际化的趋势,泰国大学专业教学的一大特点是专业课的多语种授课,如朱拉隆功大学

专业课开设有泰语、英语、中文、韩语等不同语种的授课形式。

我国高等教育的发展同样离不开国际化,而且目前国内高校的部分硕博研究招生专业也实施了申请审核制为主的“宽进严出”录取招生。这种与国际接轨的方式无疑是值得鼓励的,但“宽进严出”模式除了学生论文质量的高标准要求外,专业课的授课语种还需考虑不同语种的专业课授课形式,如经济类、金融类和法学专业的英语、法语等通用语种教学,临近东盟地区的缅甸语、泰语专业教学,东北地区的韩语、日语专业教学等,以吸引国际留学生来华留学,同时可以增加我国高等教育文化的国际化渠道。

其次,“宽进严出”的模式既对学生的学生成绩提出要求(即不能“混文凭”),同时也对大学的教育方式、方法提出了新要求。以泰国大学英语学科教学的模式为例,在专业教学中,其采用英语媒介教学(E-MI)或语言与学科融合的“CLIL教学模式”。学生入学后,需要定期进行英语能力测试,并先修一学期的语言课程或者提供最新的雅思托福成绩等。

与泰国大学类似,我国高校实行的也是学分制。同时,我国高校还要求学生在本科四年或硕士二年,博士一年内修完规定学分,不鼓励学生集中突击修学分,限制每个学期选修课程数量,并以培养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和科研意识,促进学生体验教

育过程,提升文献阅读能力为重要目的。

当下,我国高等教育虽然已经进入了内涵式发展阶段,但目前“学分制”下的教育模式和考核评估还不够多样化。未来,我们在对“宽进严出”模式进行探索的过程中,还需要要在对学生严格要求的同时,提升学生个性化体验,加强学生的文献阅读与解题能力,将大学教育的静态学习转变为动态学习与体验学习模式,使“宽进严出”模式与学分制和提升学生文献阅读能力接轨。

再次,相比泰国大学硕博教育20%左右的淘汰率,我国高校硕博人才培养的淘汰率明显偏低。近年来,随着我国高校逐渐施行申请审核制的硕博招生改革,“宽进”后的“严出”成为改革关键。国内外实践也证明,淘汰机制更能激发研究生的竞争意识和创新研究,这是我国高校实施“严出”最为核心的评价机制。而有效的“严出”措施需要全方位的科学管理,如强化学术论文学期考核、调研报告、作业测评、阶段性测试等过程性考核比重,提升硕博核心课程的评价标准,实行教考分离,由第三方评价机构进行盲评和质量把关,不断完善“宽进严出”培养模式。

最后,泰国“宽进严出”模式下,高等教育的层次化特征非常明显,其发展过程始终保持着精英化与大众化的同步功能,其大众化教育与精英化教育同步发展的理念亦值得我们思考。当下,我国高等教育已进入大众化教育阶段,高等教育的使命在于驱动创新型国家的发展。因此,在后疫情时代,我国高等教育在促进大众化发展的同时,还需提升精英化教育功能,为我国成为创新型国家培养顶尖人才,以应对后疫情时代高等教育所面临的挑战。

从目前的状况来看,我国在高等教育数量上已经总体达到目标,但在质量上却远远不够。因此,我们不能仅仅从数量上,更应该从质量上优化高等教育结构,实现服务社会的“T”字形人才培养目标,也就是大众化教育下的精英化教育与硕博人才的个性化发展。

(作者分别为中国传媒大学教授、浙江工商大学副教授)

■颜吾佴  
李敏

面对“00后”以多层次手段应对多层次性格